

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周若蓓 毕然

河南工业大学，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在六十年的中国社会治理变迁之中，“枫桥经验”的演变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迁过程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枫桥经验”诞生于基层治理，深植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之中，是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重要范例。基于此，本研究探索“枫桥经验”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内在联系，展开“枫桥经验”前沿趋势探寻，厘清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有助于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深刻把握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枫桥经验”；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DOI：10.69979/3029-2700.25.04.077

引言

“枫桥经验”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浙江诸暨的枫桥镇，由该地的干部群众创造的基层治理经验，其显著特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树立起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1]

枫桥经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教育改造阶段：枫桥地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拒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2]毛泽东同志批示全国效仿去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阶段：改革开放后，枫桥地区干部将社会管理聚焦到社会治安管理方面，强化保卫组织建设，建立调解衔接机制，形成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局面，为全国社会管理创造了典范。社会基层治理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枫桥经验实现转型升级，形成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3]强调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成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枫桥经验做出了许多重要讲话。在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化解到萌芽状态。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把问题化解在基层。总书记的讲话体现了枫桥经验推行的必要性，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1 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理论逻辑

1.1 枫桥经验理论的实际运用成果

枫桥经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典范，其理论逻辑植根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中形成了三重理论建构维度。从治理主体维度看，通过“三治融合”构建多元协同格局，如浙江诸暨市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 98.6%，验证了社会资本理论中信任网络与规范体系对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从治理过程维度分析，“四前工作法”体现风险治理前置性逻辑，借助大数据与网格化管理融合，实现基层治理范式转变，绍兴市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 37% 可证。从治理目标维度考察，将“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具象化为“民生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制度创新，宁波市基层群众参与治理比例达 72%，印证了参与式民主理论中赋权增能对治理合法性的强化效应。枫桥经验把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技术有机融合，构建了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范式，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创新提供重要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的高效发展，在各地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引领性，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的重要法宝，持续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贡献

着积极力量，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独特且具有借鉴意义的中国方案。

1.2 “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理论逻辑凸显

新时代的基层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对基层及其治理工作基础作用的深刻理解。“枫桥经验”扎根于基层实践，反映了对基层治理重要性的新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5 月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特别对基层治理工作提出：“必须坚持重视基层、强化基础的工作方向，促使重心下沉、警力下沉以及资源倾斜，以此加强基层力量，激发基层动力，提高基层战斗力。”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协调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在当今时代，城乡基层不仅是各类矛盾聚集的地方，也是政策实施的关键场所，同时还是多种风险的高发区，因此，重心下移的治理策略显得尤为紧迫。^[5]

“枫桥经验”提出以来便深深植根于基层治理的土壤中，持续关注基层的发展与稳定问题，并致力于满足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展现出显著的基层特性。它追求在基层解决矛盾，并强调工作重点应下移，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时注重基层视角的态度，以及他们重视在基层阵地开展工作、解决矛盾的政策方向。因此，“枫桥经验”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借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

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推广“枫桥经验”，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同志不懂得如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依赖群众的力量，通过理性辩论来压制对手，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控制，却往往倾向于仅依靠公安和司法部门，采取直接的措施解决问题。”这一指导思想说明，党组织应当注重激发群众的参与意识，不应仅仅依赖政府机构；“枫桥经验”提倡结合教育引导和法律惩戒的方法，通过理性辩论的方式改造对手，而非仅使用强制手段达到目标，体现了治理手段科学化、治理过程民主化等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政联合行动、各自承担责任”“‘三治’融合”“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共享成果”等理念的引入，进一步推动了“枫桥经验”在治理理念、体系和方式上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融合。诸暨地区包含

“全面协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多层次的社会安全防控网络、广泛覆盖的矛盾调解机制、积极向上的乡村文化价值观、普及化的法律服务保障体系”等核心要素的基层治理模式被建立起来，为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新思路。

2 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践路径

2.1 聚焦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向核心化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事实证明，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也是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应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下功夫，确保党的组织工作实现基层治理全覆盖。一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优化党建引领模式。着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领导架构，严格执行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一岗双责”，科学规划党建活动，确保在党的领导下，基层事务能够稳步开展。二是注重基层党组织建设。选拔和培养基层干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从乡贤、优秀青年、退役军人及第一书记等群体中选拔和培训人才，提升他们服务群众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基层干部的考核与激励机制，形成乡镇、村（社区）平安建设的协调机制和责任框架，将平安建设的成绩纳入党建与发展的综合评估及目标治理考核中，明确基层在平安创建中的主要责任。

2.2 打造共治格局，促进基层治理向协同化转型

2019 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借鉴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明确政府自身的任务。发挥政府核心领导作用，与社会力量建立合作关系，在基层治理中弱化传统“治理者”定位，通过下放权力、购买服务等手段，促进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成长，推动治理和服务重心下沉至基层，扩大基层自治范围。其次，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基层治理围绕人展开，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需培养群众公民参与意识。设计激励措施、增强教育宣传，激发群众作为社区主人翁的责任感和民主权利意识。最后，积极促进基层民主发展，鼓励更多人参与基层事务治理，对于基层出现的矛盾，采取民主方式解决。

2.3 重视制度建设，助力基层治理向规范化转型

新时代的“枫桥经验”着重于基层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强调制度供给的重要性，注重社会规范在基层民众日常生活和矛盾化解中的作用，以实现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和可持续性。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改进和完善村规民约等规范，促进社会风气的改良和家庭美德的培养。二是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讨论时指出，要坚持并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优化处理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将矛盾纠纷在基层和初始阶段解决。在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过程中，秉持平等自愿、公正合法、高效原则，在法律解决纠纷的同时融入道德教育和公共舆论的引导。三是在处理方式上优先在城乡社区等基层自治单位，由行政机关及各种自治团体主持调解，促使矛盾双方达成和解。四是制度层面，通过立法明确各相关主体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中的角色、责任和功能，规范其行为，确保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妥善处理。^[6]

2.4 发挥科技支撑，推进基层治理向智能化转型

首先，科学技术改善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式，当科技引入“枫桥经验”之中，使得基层治理更加科学化、智能化。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基层治理得以实现精细化和精确化，使得基层政府提供的服务更加科学化和有针对性，能够及时的满足民众的需求；其次，科技赋能“枫桥经验”使得基层治理效能大大提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也大大提升。因而，在推广“枫桥经验”时需要进一步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用科技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和水平。一是加强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支持基层治理工作，创建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广泛整合各类信息资源，实时分析研判预警监测，同时建立信息共享的制度，实现跨部门信息数据共享。二是实施“互联网+网格化”。建立网格化治理的服务团队，指定专人负责治理加强定期巡查走访，收集、整理民众的需求信息，处理矛盾纠纷，实施群防群治，将任务细化并分配，对相关问题给予针对性的答复，提高基层治

理的精细度、深度和覆盖面。^[6]

3 结语

综上，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更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党的全面引领，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致力于在现场解决各种冲突，从而达到社会秩序与活力之间的良好平衡。面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挑战，应充分利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优势，推动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 [1] 罗嗣亮,方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逻辑、鲜明特征、制度保障[J].党的文献,2024,(05)
- [2] 雷树虎.“枫桥经验”发展演进的四重逻辑——从毛泽东到习近平[J].科学社会主义,2020(3):110-115.
- [3] 张力伟,吴楠.整合与介入：“矛盾不上交”的基层治理逻辑[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4,26(06)
- [4] 郝铁川.论枫桥经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J].政治与法律,2024,(07)
- [5] 刘开君.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J].党政论坛,2023(4):48-50.
- [6] 陈荣卓,杨广西.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J].江汉论坛,2024,(01)
- [7] 李梦兰,唐鸣.信息技术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样态、驱动逻辑与发展方向[J].江汉论坛,2025,(01)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24年6月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10463036）

作者简介：周若薇（2004-），女，汉族，河南省郑州市，河南工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
毕然（2004-），女，汉族，陕西省延安市，河南工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